

**文章题目：**《海外宗族网络对本土成员的经济福利影响：来自涉侨族谱的证据》

**文章所属专业委员会领域：**发展经济学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在诸多方面贡献于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建设，对本土的宗族成员提供定向支持是其中的一种重要形式。本文匹配 2005 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涉侨族谱数据，发现同一地区涉侨越多的姓氏族群：1) 具有更好的住房条件，但并未具有更高的教育程度或劳动收入；2) 更大概率在经济上依赖家族其他成员的支持；3) 在就业上，劳动参与率较低，工作时长较短，但同时也更有可能创业。机制分析显示海外宗族网络对本土宗族成员形成了一定的分化效应：一方面，海外亲族提供的经济支持削弱了部分本土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海外宗族网络提供了海外市场信息与融资支持，从而使涉侨的本土族群更容易从事出口方面的生意，促进了创业行为。本文的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延续到了海外华人群体之中，海外宗族网络从“输血”和“造血”两个渠道改善本土成员的经济福利状况，并促进了侨乡地区的出口网络形成。

**关键词：**宗族网络 宗族文化 涉侨族谱 经济福利

# 海外宗族网络对本土成员的经济福利影响： 来自涉侨族谱的证据\*

陈方豪 左毅博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在诸多方面贡献于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建设，对本土的宗族成员提供定向支持是其中的一种重要形式。本文匹配 2005 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涉侨族谱数据，发现同一地区涉侨越多的姓氏族群：1) 具有更好的住房条件，但并未具有更高的教育程度或劳动收入；2) 更大概率在经济上依赖家族其他成员的支持；3) 在就业上，劳动参与率较低，工作时长较短，但同时也更有可能创业。机制分析显示海外宗族网络对本土宗族成员形成了一定的分化效应：一方面，海外亲族提供的经济支持削弱了部分本土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海外宗族网络提供了海外市场信息与融资支持，从而使涉侨的本土族群更容易从事出口方面的生意，促进了创业行为。本文的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延续到了海外华人群体之中，海外宗族网络从“输血”和“造血”两个渠道改善本土成员的经济福利状况，并促进了侨乡地区的出口网络形成。

**关键词：**宗族网络 宗族文化 涉侨族谱 经济福利

## 一、引言

自古以来，海外华人一直扮演着中国对外经济与社会联系的桥梁，推动着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王赓武，2016）。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更是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中（任贵祥，2009；陈弈平和曹锦洲，2023）。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准确客观地评估海外华人对于中国本土发展的贡献，总结其中的机制与经验，是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新时代做好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在面对新时期复杂国际环境促进国内国外双循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任务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海外华人与祖国的密切联系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中华文明中源远流长的宗族文化的影响。在迁居地，海外华人并不因移民而断绝其与祖籍地的联系。受传统文化影响，他们仍然保持着对乡土、家国的认同，另一方面他们的个人价值很大程度上也需要由家乡宗亲的认同而体现。因此海外华人经常自发组成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各类社团，通过寄送书信与家乡宗亲保持联系并提供经济支持（孔飞力，2016；班国瑞和刘宏，2022）。在祖籍地，即使是移民海外的宗族成员，其去向和后代延续仍然会被族谱记录在册（林金枝，1984）。很多早年侨居海外的第一代移民也会重视将在海外出生成长的二三代移民带回家乡参与宗族祭祀活动，从而培养后代对于祖籍地的情感，提升宗族身份的认同（Tan, 2006）。借由此，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得以在海外侨胞族群中延续传递。改革开放后，以宗族为纽带的海外华人网络迅速被激活，为中国经济建设做出了先驱性的贡献（Lever-Tracy et al., 1996；龙登高，1999；傅高义，2013；陈方豪和熊瑞驰，2022）。

然而，截至目前针对海外宗族网络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严格实证研究仍然十分匮乏。大部分的现有研究以定性为主，少量定量研究侧重于从宏观的层面来测度移民网络对贸易和投资的促进（Rauch and Trindade, 2002；Gao, 2003；Tong, 2006；林勇，2007；蒙英华，2015），

---

\* 陈方豪、左毅博（通讯作者），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510632，电子信箱：fhchen2017@nsd.pku.edu.cn, zuoyibo@stu2021.jnu.edu.cn。

但并未推广到对微观个体的经济福利层面，也并未对宗族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做特别的探讨。一个例外是 Chen et al. (2023)，他们以工商注册与人口普查中的姓氏信息识别宗族网络，发现宗族网络促进了海外华人对其祖籍地的投资。但针对海外宗族网络对本土个体成员影响的实证研究则仍然是一个空白。

该领域实证研究的推进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数据可得性。第一，在古代中国，民间的对外移民行为并不为官方认可或支持，因而鲜被记录于官方档案并形成系统性的史料（彭慕兰和托皮克，2022）。因此，现有研究大多使用国家层面的移民数量作为一种移民网络的宏观加总度量，但其精细度有限，不适宜与个体数据相匹配使用。第二，个体层面的海外社会联系属于隐私信息，并不轻易可得。少量的外国文献依赖于特定情境下形成的局部样本而非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Yang, 2011）。

本文的核心贡献即在于以最新电子化的涉侨族谱数据库突破上述研究的瓶颈。已有许多研究者注意到族谱在研究宗族网络上所具有的价值（Shiue, 2016; Greif and Tabellini, 2017; 潘越等, 2019; Zhang, 2020），但较少学者注意到其中记录家族成员迁移活动的特殊子类——涉侨族谱在研究跨境宗族网络上的独特性。涉侨族谱所具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即使是移民海外的宗族成员，其去向和后代延续仍然会被族谱记录在册（林金枝，1984），这为本文研究海外华人与本土家庭成员之间的关联及相互影响提供了突破口。本文借助涉侨族谱中的地点和姓氏信息，并结合宗族文化中“安土重迁”的内涵<sup>①</sup>，本文得以构建起“地区-姓氏”层面的海外宗族网络测度。这一测度的额外优势在于涉侨族谱的修撰大多可以追溯至明清乃至唐宋时期，移民行为要大大早于当前世代，且随着时代变迁持续不断，因此对于生活在改革开放后时期的本土成员而言，基于涉侨族谱的海外宗族网络测度是一个历史上前定的（pre-determined）稳定变量，可以大大降低实证上对于网络内生性的担忧。

本文借鉴潘越等（2019）和 Zhang（2020）的做法，使用涉侨族谱数量测度海外宗族网络强度，并进一步细化加总至“地区-姓氏”层面，匹配 2005 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个人层面的经济福利指标来考察其影响。在控制了全国层面的族谱数量之后，本文发现海外宗族网络依然对本土成员的经济福利产生额外的正面影响，不过呈现一定的分化效应：一方面，海外宗族网络改善本土家族成员的财富水平（以住房条件为度量）、提高了本土家族成员成为企业家的概率；另一方面，也导致本土家族成员会更加依赖家族其他成员的扶持，进而降低自身劳动意愿和减少受教育水平。这些结论在改变宗族网络测度方法、考虑迁移样本和现住地族谱、选用广东福建子样本后依然成立。本文使用 1998 年至 2007 年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做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海外宗族网络为本土私营企业家提供海外信息渠道、克服融资困难，从而促进了企业的出口，而一般的宗族网络则无法发挥类似的功能。本文的实证发现表明“心系故乡”、“反哺桑梓”的传统宗族文化延续至了海外华人群体，并经由宗族的纽带从“输血”（即转移支付）、“造血”（即融资支持创业，分享出口市场信息）两个渠道改善了本土家族成员的经济福利状况，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侨乡的经济结构。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过往文献大多讨论跨国移民对其迁入地宏观层面的长期影响（Burchardi et al., 2019; Sequeira et al., 2020），本文则反过来聚焦其对留守迁出地移民家庭成员微观层面的经济福利的影响及其机制，并创新性地使用涉侨族谱作为材料进行实证度量；第二，过往研究对宗族网络产生的福利效应探讨多限于本地或国内的移民（阮荣平和郑风田，2012；郭云南和姚洋，2013；郭云南等，2013；林建浩等，2016；陈斌开和陈思宇，2018；潘越等，2019；Zhang, 2020），本文则将其推广至海外华人及因其移民活动而形成的跨境宗族网络；第三，本文丰富了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文献。过往研究认为一些历经长期演化的区域性文化，如海洋性文化、商帮文化等，对当代中国的商业与经济活动产生了长远影响（赵子乐和林建浩，2019；刘蓝予等，2021）。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将研究视角拓宽至海外华人群体，表明传统的宗族文化延续到了海外华人群体之中，并且许多促进创业与经商的文化是以宗族作为载体或纽带得以实现。由于

---

<sup>①</sup> 中国宗族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非常丰富（Freedman, 1965）。本文侧重从“安土重迁”——即特定姓氏与地区跨越时间的强关联——展开探讨（袁义达和张诚，2002）。在中国，宗族成员指当前或祖上居住邻近区域并具有共同的父系祖先且具有相同姓氏的族群。在长期的相处中，宗族成员结成了紧密的社会网络，并且其中的情感纽带很多时候并不以人员的迁移而发生改变。孔飞力（2016）对此有过精妙的论述，本文在第二节中有详尽的探讨。

采纳的视角不同，本文与之前文献属于不同维度上的互补性研究。

本文后续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总结并探讨与本文相关的文献；第三部分对所涉及的数据进行描述分析并介绍本文的实证策略；第四部分基于手动收集的涉侨族谱数据、全国族谱数据和 2005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实证检验海外宗族网络的经济福利效应；第五部分结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探究海外宗族网络促进创业的作用机制；第六部分为稳健性检验；第七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 二、背景与文献综述

### 1. 国际移民对迁出国（地区）的经济社会影响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移民作为连接国家之间的桥梁，促进了贸易、投资、科技创新、价值观念的流动，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Rauch and Trindade, 2002; Saxenian, 2006; Kerr, 2018）。显然，移民行为会同时影响流入地流出地的经济社会状况，但由于数据可得性的不对称，大部分现有文献集中关注移民对于迁入地（通常是发达国家）带来的影响（Burchardi et al., 2019; Sequeira et al., 2020），而对于移民行为对其迁出地（通常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留守迁出地的本土家庭成员的影响研究则相对缺乏。

从国际比较来看，关于移民对于迁出地的经济影响是正或负仍存在一定分歧。实证证据发现，对于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缺乏高薪工作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海外移民寄往留守家庭成员的侨汇（remittance）可以促进本地的物质资本投资（Giuliano and Ruiz-Arranz, 2009），补贴留守家庭成员的消费并资助他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Yang, 2011; Khanna et al., 2022），带来正面的效应。但另一方面，由于移民通常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劳动效率，他们的离开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流失，长期来看制约了迁出国的发展潜力（Gibson et al., 2011; Docquier and Rapoport, 2012）。也有大量研究表明，海外移民网络通过克服信息和制度壁垒，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间接的溢出效应，包括但不限于促进了贸易（Rauch and Trindade, 2002; Bahar et al., 2022）、投资（Burchardi et al., 2019）和技术传播（Saxenian, 2006; Agrawal et al., 2011）。本文的研究为这一支文献提供来自中国——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及全球第四大移民总量国——的微观实证证据。<sup>①</sup>

聚焦于中国，华人华侨研究学者长期致力于探究海外华人在中国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王赓武, 2016）。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移民历史的国家，最早可追溯至唐宋时期。移民活动数百年来绵延不绝，建立起了侨乡与迁入地之间的一条条移民通道（corridor），编织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移民网络（孔飞力, 2016）。改革开放后，上述移民网络得以激活，海外华人得以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中（任贵祥, 2009; 陈弈平和曹锦洲, 2023）：一方面，海外华人以投资企业的方式开启了中国利用外资的实践，引领了中国非公经济的发展（林勇, 2007; 龙登高和李一苇, 2018; 陈方豪和熊瑞驰, 2022; Chen et al., 2023）。另一方面，海外华人还经常参与对家乡的转移支付，例如寄送侨汇、或对家乡交通、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公共品进行慈善捐赠等，从而促进了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张秀明, 2008; 班国瑞和刘宏, 2022）。间接来看，海外华人还在与大陆的互动中产生了诸多方面的溢出效应：例如提供海外市场信息、传播市场观念、促进制度开放等等（龙登高, 2001; 王望波, 2005; 蒙英华, 2015）。

本文对该部分文献的主要贡献为：借助中国的宗族文化内涵，创新地引入使用涉侨族谱这一新材料，来从微观层面对过往难以观测到的本土个体的海外移民网络进行了测度，克服了数据的缺失，并结合全国代表性的数据综合评估了海外宗族网络的福利效应。

<sup>①</sup> 根据联合国全球移民数据库（UN Global Migration Database），截止 2020 年，中国的海外移民存量达到了 1046 万人，仅次于印度、墨西哥、俄罗斯位居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的第四位（网址：<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d/content/internationalmigrant-stock>，提取时间：2023 年 4 月 18 日）。许多本土学者的估计的海外人口规模往往要更大（庄国土, 2011），这是由于双方的统计标准不一：联合国全球移民数据库是以转换国籍为标准来定义移民，而许多海外华人族群受到传统文化和教育传承的影响，在移民后历经数代之后仍然对华人身份保有认同（孔飞力, 2016），有学者认为也应纳入统计。

## 2. 宗族文化与宗族网络

中华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着当代经济的发展（林建浩等，2018），从诸多方面塑造着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Greif and Tabellini, 2017）。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一些历经长期演化的中国内部的区域性文化，如海洋性文化、商帮文化等，对当代中国的商业与经济活动产生了长远影响（赵子乐和林建浩，2019；刘蓝予等，2021）。本文将研究的视角拓展至一个容易被忽视但是同样浸润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群体——海外华人。

海外华人与祖国的密切联系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中华文明中源远流长的宗族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宗族文化脱胎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长期聚族而居而形成的“差序格局”属性（费孝通，1998），形成了宗族成员对于“落叶归根”、“衣锦还乡”、“造福桑梓”的心理需要，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样的宗族文化很大程度上延续到了海外华人群体之中，表现为一种“离乡不离根”的中国特色迁移文化。如孔飞力（2016）所描述：“中国文化中的‘安土重迁’并不意味着固守乡土，而是表现为即便远离家乡仍保持着与故乡故土从情感到物质的关联。迁移者背负的往往是家庭乃至家族的振兴期待，他们的“家”始终扎根在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中国人所说的‘一家人’，可能分别居住在相隔万里的地方，但通过经济上的互惠仍互视为‘一家人’。因此，中国人异地流动迁移，并不是与出生地与与生俱来之血缘群体的分离，而是既有血缘纽带的跨边界、跨地域扩展。”然而，尚未有研究者对这样一种与迁移活动相融合演化的特殊宗族文化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本文以涉侨族谱作为实证测度的材料填补了这一空白。

已有丰富的研究表明，乡村社会中的社会网络，尤其是以血缘或姓氏为纽带构建起的宗族网络在介绍非农工作（章元和陆铭，2009）、外出打工（郭云南和姚洋，2013）、获取融资（马光荣和杨恩艳，2011；郭云南等，2013；林建浩等，2016）、促进创业（Peng, 2004；陈斌开和陈思宇，2018；Zhang, 2020）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私营经济发展背后的重要微观基础。本文对这一支文献的贡献在于将其推广至海外华人及因其移民活动而形成的跨境宗族网络，并实证检验了跨境宗族网络是否发挥了有别于一般宗族网络的作用。

在实证测度上，早期的研究通常使用微观调查数据中村庄中同姓人口规模或占比作为宗族规模的测度，以是否宗祠、族谱作为宗族强度的测度（郭云南和姚洋，2012；郭云南等，2013；林建浩等，2016）。后期随着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族谱数据库被建立起来，学者们开始直接使用族谱数量作为地区宗族文化的代理变量（Greif and Tabellini, 2017；Chen et al., 2020；潘越等，2019；Zhang, 2020）。此处本文的贡献在两个方面：首先，本文首次使用涉侨族谱这一新的材料来源，将宗族网络的测度涵盖到了海外华人群体（林金枝，1984）；其次，本文将族谱数量进一步细化加总至“地区-姓氏”层面，一来更好地体现“宗族”以姓氏为组织单位的特征，二来也大大降低了出现遗漏变量的可能性。

## 三、数据与实证策略

### 1. 数据来源及变量构造

本文综合了多来源、多层次的数据以探究与海外的宗族联系对本土家族成员的影响及其机制。附录1对本文使用的变量的来源与定义做了一个综合的简述。本小节旨在对各来源的数据和本文所做的处理进行逐一详细的说明。

#### （一）涉侨族谱

本文使用的核心资料来自于暨南大学图书馆提供的华侨华人族谱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了来自福建、广东、浙江等海外移民大省自明清两代起的376份共三千余册涉侨族谱，就笔者所知是全国目前唯一系统性整理该类型族谱的独特数据库。

在古代中国，民间的海外移民行为并不为官方认可或支持，因而鲜被记录于官方档案并形成系统性的史料（彭慕兰和托皮克，2022），仅有少部分侨乡地区的地方志记录了部分年份的不完整数据。

涉侨族谱则为研究海外华人与本土家庭成员之间的关联及相互影响提供了重要突破口。涉侨族谱所具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即使是移民海外的宗族成员，其去向和后代延续仍然会被族谱记录在册（林金枝，1984），这使得研究者可以观察到本土个体与海外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

为了实证测度海外宗族网络，本文手动将涉侨族谱中的姓氏和祖籍地（精细到地级市层面）位置信息电子化，并将族谱的数量加总到“姓氏-地级市”层面，作为海外宗族网络强度的代理变量。

## （二）全国族谱

一份涉侨族谱的存在同时反映了一个“涉侨”和“宗族网络”两方面的信息，因而要精准评估“涉侨”方面带来的效应，研究者还需要控制本土“宗族网络”带来的影响。本文参考过往文献中的做法（Greif and Tabellini, 2017；潘越等，2019；Chen et al., 2020；Zhang, 2020），使用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CCCCG）》中收录的大约 46000 本来自全国的族谱作为本土宗族网络的测度素材。类似于涉侨族谱，本文使用 Dincecco and Wang（2020）标注后的姓氏和谱系位置的信息将族谱数量加总到“姓氏-地级市”层面，作为本土宗族网络强度的代理变量。

## （三）2005 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本文使用国家统计局开展的 2005 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作为个人层面经济社会状况的变量来源。选择该数据库的原因有两点：首先，该数据库具有官方普查性质，访问了全国 0.2% 的人口，在地级市层面具有全国代表性且覆盖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地市，因此要优于大多数的微观调查数据库；其次，该数据库汇报了个人层面丰富的有关住房、收入、教育、就业情况等的信息，特别该数据还提供了受访者的姓氏信息，从而本文可通过被访者姓氏和位置信息将其与涉侨族谱、全国族谱数据进行匹配。

## （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

本文使用 1998 年至 2007 年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来研究海外宗族网络对于私营企业经营的影响。该数据库是目前可获得的最大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虽然在企业规模上有截断（只收录国有企业和主营业务收入在 500 万以上的非国有企业），但在产出意义上对地区经济具有较高的代表性（Brandt et al., 2014）。本文参照谢千里等（2008）和余淼杰（2013）的方法进行样本筛选，并通过企业法人姓氏和位置信息与涉侨族谱、全国族谱数据进行匹配。具体处理流程可见附录 2。

表 1 和表 2 对在人口和族谱数量上排在前十位的姓氏和地区进行了描述，从中可以看出两方面的特征：第一，族谱数量的排序不必然与人口规模的排序相一致，例如林姓并非全国层面的大姓，但在涉侨族谱总数中却高居第二位，我国的人口大省河南、山东并则没有与之人口数量相当的族谱留存。这说明宗族文化的强度在不同姓氏、不同的地区之间具有异质性，这为本文的识别提供了便利；第二，全国族谱与涉侨族谱的姓氏分布、地理分布既有重叠又有差异，特别地，虽然全国族谱数量高的地区包括许多沿海省份，涉侨族谱则尤其集中于侨乡众多的闽粤两地，与我国移民的基本情况相一致。这提示我们有必要在实证分析中：1）区分本土宗族网络和海外宗族网络发挥的作用；2）对福建和广东两省做特殊探讨。<sup>①</sup>

<sup>①</sup> 详见第四节稳健性检验的部分。

表 1

数量前 10 位的姓氏

人口普查			全国族谱			涉侨族谱		
姓氏	数量	占比	姓氏名称	数量	占比	姓氏	数量	占比
王	114632569	8.04%	陈	2335	5.85%	黄	24	6.40%
李	113213513	7.94%	王	2323	5.82%	王	22	5.87%
张	105678828	7.41%	张	2044	5.12%	林	20	5.33%
刘	80680550	5.66%	李	1513	3.79%	张	19	5.07%
陈	70065673	4.91%	刘	1410	3.53%	陈	18	4.80%
杨	52787708	3.70%	黄	1342	3.36%	李	16	4.27%
黄	37013487	2.59%	吴	1147	2.87%	吴	16	4.27%
赵	32793643	2.30%	徐	988	2.48%	刘	10	2.67%
吴	31824846	2.23%	周	970	2.43%	徐	9	2.40%
周	30309461	2.12%	朱	889	2.23%	郑	9	2.40%

数据来源：人口普查数据（2005 年）、《中国家谱综合目录（CCCCG）》、《华侨华人族谱数据库》。

表 2

数量前 10 位的省份

人口普查			全国族谱			涉侨族谱		
省份名称	数量	占比	省份名称	数量	占比	省份名称	数量	占比
广东省	109052732	7.64%	浙江省	12273	30.76%	福建省	337	66.73%
河南省	104092893	7.29%	湖南省	6944	17.40%	广东省	112	22.18%
山东省	100135320	7.01%	江苏省	3994	10.01%	江西省	22	4.36%
四川省	91310504	6.40%	江西省	3230	8.09%	浙江省	10	1.98%
江苏省	81503667	5.71%	广东省	2432	6.09%	湖南省	8	1.58%
河北省	76723425	5.37%	安徽省	2279	5.71%	安徽省	3	0.59%
安徽省	75288072	5.27%	福建省	2247	5.63%	广西壮族自治区	3	0.59%
湖南省	69100100	4.84%	山东省	1053	2.64%	江苏省	3	0.59%
湖北省	62244835	4.36%	湖北省	1012	2.54%	四川省	2	0.40%
浙江省	53521603	3.75%	河南省	927	2.32%	内蒙古自治区	1	0.20%

数据来源：人口普查数据（2005 年）、《中国家谱综合目录（CCCCG）》、《华侨华人族谱数据库》。

表 3

描述性统计

	年份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b>个人层面</b>				
涉侨族谱数量（本）	—	1912076	0.043	0.422
全国族谱数量（本）	—	1912076	3.410	11.710
住房建筑面积（十平方米）	2005	1912076	8.844	5.154
住房间数（间）	2005	1912076	3.116	1.725
住房内拥有独立厕所	2005	1912076	0.728	0.445
拥有购建住房	2005	1912076	0.868	0.339
购建住房费用（元）	2005	1659197	33512.890	43506.480
月租房费用（元）	2005	252461	108.508	141.996
主要生活来源由家庭其他成员供养	2005	1861963	0.228	0.419
主要生活来源为保障性收入	2005	1861963	0.076	0.265

主要生活来源为财产性收入	2005	1861963	0.004	0.062
主要生活来源为劳动收入	2005	1861963	0.678	0.467
上月劳动收入（元）	2005	1272615	584.865	659.065
受教育年限（年）	2005	1912076	8.087	3.850
接受过教育	2005	1912076	0.889	0.315
大于小学教育程度	2005	1912076	0.621	0.485
大于初中教育程度	2005	1912076	0.220	0.414
大于高中教育程度	2005	1912076	0.069	0.253
大于专科教育程度	2005	1912076	0.024	0.153
大于本科教育程度	2005	1912076	0.001	0.039
上周在工作	2005	1861963	0.672	0.470
上周工作小时数（小时）	2005	1250073	45.375	12.593
发生迁移	2005	1250073	0.090	0.287
在公共部门工作	2005	1250073	0.155	0.362
私营创业	2005	1250073	0.107	0.310
性别（男取1）	2005	1912076	0.495	0.500
年龄（年）	2005	1912076	41.136	16.803
家庭人口（人）	2005	1912076	4.148	1.646
健康	2005	1912076	0.970	0.170
汉族	2005	1912076	0.907	0.291
非农业户口	2005	1912076	0.292	0.455
已婚	2005	1912076	0.800	0.400
<b>企业层面</b>				
涉侨族谱数量（本）	——	122789	0.113	0.745
全国族谱数量（本）	——	122789	10.474	25.927
是否出口（是取1）	1998-2007	122789	0.198	0.399
企业出口额度（千元）	1998-2007	122789	8658.553	56166.360
企业出口额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	1998-2007	122789	0.094	0.249
TFP	1998-2007	122789	0.330	0.386
资本密度	1998-2007	122789	138.062	192.956
企业存续年数（年）	1998-2007	122789	6.561	6.828
港澳台资本占比	1998-2007	122789	0.001	0.014
外商资本占比	1998-2007	122789	0.0005	0.013
政府资本占比	1998-2007	122789	0.002	0.034

资料来源：详细定义见附录 1。

## 2. 实证策略

为了评估海外宗族网络对于个人层面经济社会福利的影响，本文的基准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Y_{isoc} = \beta_1 \times Lineage_{so} + \beta_2 \times Diaspora_{so} + \alpha_s + \delta_c + \theta \times X_i + \epsilon_{isoc} \quad (1)$$

其中下标*i*、*s*、*o*、*c*分别代表个人、姓氏、出生地市、当前所在地市。 $\alpha_s$ 和 $\delta_c$ 分别为姓氏和所在地（地级市层面）固定效应，控制了姓氏之间、地市之间固有的发展水平差异。 $Y_{isoc}$ 是本文关心的被解释变量，表示一系列个人层面的经济社会地位指标，包括住房条件、收入水平、职业、教育等。姓氏*s*在其出生地市*o*的全国族谱数量 $Lineage_{so}$ 和涉侨族谱数量 $Diaspora_{so}$ ，作为宗族网络强度的代



理变量,是本文主要关心的解释变量。<sup>①</sup>同时加入两个解释变量的目的在于可以区分本土宗族网络和海外宗族网络带来的影响。解释变量的构造参考了过往文献的做法(Greif and Tabellini, 2017; 潘越等, 2019; Chen et al., 2020; Zhang, 2020)。使用族谱数量这一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而言前定的变量,大大降低了实证上对于网络内生性的担忧。此外,本文进一步将族谱数量细化加总至“出生地-姓氏”层面,一来更好地体现“宗族”以姓氏为组织单位的特征,提高了估计的准确度,二来也大大降低了出现遗漏变量的可能性<sup>②</sup>。本文还进一步控制了为一系列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 $X_i$ ,包含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家庭人口、健康状况、民族、户口性质以及婚姻状态。最后, $\epsilon_{isoc}$ 表示随机误差项。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将标准误聚类于地级市层面,以体现潜在异方差与时序相关性对于标准误估计的影响。

## 四、实证结果

经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大致将海外宗族网络影响本土成员经济福利划分为两种渠道:第一种渠道是“输血”,即海外亲族通过经济资源的转移支付,包括侨汇或者捐赠,直接地转化为本土成员的消费或财富,从而短期内改善其福利状况;第二种渠道是“造血”,即海外亲族通过分享他们自身在信息、财富等方面的优势帮助本土成员对自身的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最终实现本土成员的自力更生,在长期改善其福利状况。从国际比较来看,关于移民对本土成员的影响是正或负仍存在一定分歧(Yang, 2011),本小节借助中国的宗族文化背景为这一支文献补充中国情境下的探讨。

### 1.海外宗族网络的“输血”效应

#### (一)住房条件

表4呈现了以住房条件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1)的估计结果。住房构成了中国家庭的主要财富资产,且与个人的消费密切相关(黄静和屠梅曾, 2009),因此我们以其作为个体的财富和消费指标的代理变量。<sup>③</sup>

第(1)至(3)列的结果显示,个人出生地的姓氏每增加100本全国族谱,个人住房建筑面积平均增加14.43平方米,房间数平均增加0.254间,拥有独立厕所的概率提高9.7%;而每增加10本涉侨族谱,个人住房建筑面积平均增加31.673平方米,房间数平均增加0.8526间,拥有独立厕所的概率提高11.46%。这表明无论是本土宗族网络和海外宗族网络都能显著提升个人的住房消费水平。第(4)的结果表明,本土宗族网络和海外宗族网络都显著提高了个人拥有住房的概率,但第(5)列表明只有海外宗族网络显著提高了购建住房的费用。第(6)列使用不拥有独立住房的群体作为回归样本,显示无论是本土还是海外宗族网络都没有显著提高个人在租房上的花销。

综合而言,在控制了本土宗族网络的影响后,海外宗族网络仍对本土家族成员的住房条件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且主要通过资助自主购建住房实现。这反映了海外华人相对于本土成员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可以为本土成员提供充裕的转移支付支持其在住房方面的投资。自有住房作为一种“地位商品”(status good),可以最大程度直接展示海外华人对故乡成员的扶持,建立海外华人在家乡的认可度,满足其“造福桑梓”的一种心理需要,这与很多侨乡地区的现实是一致的,也是宗族文化的一种直接体现。

<sup>①</sup> 诚然,全国族谱数据库和涉侨族谱数据库不太可能穷尽收录全国范围内所有的族谱,但理论上只要一个地区的一个姓氏被收录的概率与其宗族文化的强度相关,我们即可将族谱数量作为合理的代理变量使用。

<sup>②</sup> 在所有回归中,本文都控制了姓氏和出生地固定效应,因此遗漏变量只可能来自于“姓氏-所在地”层面。作为对比,过往研究通常只在地区层面加总族谱数量作为宗族文化的度量。

<sup>③</sup> 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并未汇报个人消费方面的数据。

表 4

海外宗族网络的直接效应：住房层面

	(1)	(2)	(3)	(4)	(5)	(6)
	住房建筑面积 (十平方米)	住房间数 (间)	住房内拥有 独立厕所	拥有购建住房	$\text{arcsinh}^{-1}$ (购建住房费用)	$\text{arcsinh}^{-1}$ (月租房费用)
全国族谱数量 (100 本)	1.443*** (0.329)	0.254*** (0.059)	0.097*** (0.023)	0.118*** (0.031)	0.025 (0.024)	0.086 (0.083)
涉侨族谱数量 (100 本)	31.673*** (11.958)	8.526** (3.499)	1.146** (0.444)	2.738*** (0.997)	0.937*** (0.334)	-0.890 (1.930)
观测数	1,912,076	1,912,076	1,912,076	1,912,076	1,659,197	252,461
调整后 R <sup>2</sup>	0.192	0.237	0.174	0.185	0.209	0.17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姓氏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聚类到地级市层面。\*\*\*，\*\*，\*分别代表结果在 1%，5%，10%统计意义上显著。第（5）列使用拥有购建住房（有自建住房或购买商品住房或购买经济适用房或购买原公有住房）的群体样本，第（6）列使用租赁公有住房、租赁商品住房等的群体样本。第（5）和第（6）列对购建住房费用（元）、月租房费用（元）做了反双曲线函数（ $\text{arcsinh}^{-1}$ ）的变换。

### （二）收入状况

表 5 估计了海外宗族网络对于本土成员收入状况的影响。第（1）至第（4）列的结果显示，随着海外宗族网络的增强，个人有更小的概率以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而更大概率依赖其他家庭成员的转移支付生活。本土宗族网络也有类似的效果，但它同时会显著降低个人依赖保障性收入生活的概率。第（5）列考虑劳动收入不为零的样本，发现海外宗族网络不仅显著降低了个人以劳动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概率还降低了劳动收入的金额，而本土宗族网络则没有发现类似的效应。两种宗族网络的效果差异可能反映拥有海外宗族联系的个体获得的转移支付额度较高，劳动积极性受到了削弱。综合表 4 和表 5，具有海外宗族联系的个人并未拥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却有更好的居住条件，这更加佐证了海外华人对家乡“输血”渠道的存在。

表 5

海外宗族网络的“输血”效应：收入状况

	(1)	(2)	(3)	(4)	(5)
	主要生活来源是否由 家庭其他成员供养	主要生活来源是 否为保障性收入	主要生活来源是 否为财产性收入	主要生活来源 为劳动收入	上月劳动收入>0 样 本 $\text{arcsinh}^{-1}$ (上月劳动收入)
全国族谱数量 (100 本)	0.026*** (0.008)	-0.008** (0.003)	0.003* (0.002)	-0.022*** (0.005)	0.008 (0.019)
涉侨族谱数量 (100 本)	0.822*** (0.154)	-0.096 (0.082)	0.025 (0.017)	-0.850*** (0.112)	-1.903* (1.052)
观测数	1,861,963	1,861,963	1,861,963	1,861,963	1,272,615
调整后 R <sup>2</sup>	0.303	0.273	0.005	0.393	0.46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姓氏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聚类到地级市层面。\*\*\*，\*\*，\*分别代表结果在 1%，5%，10%统计意义上显著。第（5）列使用上月劳动收入>0 的样本。

总而言之，海外宗族一方面提供了充裕的转移支付，改善了本土成员的消费和财富水平，但可能同时养成了本土成员的依赖性，对本土成员劳动供给（包括劳动参与与劳动时长）形成了负面激励，挤出了能够形成长效的“造血”机制。本文将在下一节做进一步的探讨。

## 2.海外宗族网络的“造血”效应

### （一）教育状况

我们首先检验海外宗族网络的是否促进了本土成员在教育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结果展示于表6。第（1）列的数据表明，平均而言，当个人出生地的姓氏每增加100本全国族谱时，个人受教育年限将增加0.165年，而当一个地级市的一个姓氏每增加10本涉侨族谱时，个人受教育年限则将减少0.203年。将取得不同教育程度作为哑变量进行进一步回归发现，拥有更强本土宗族网络的个体更有可能获得大于小学和初中的教育程度，而拥有更强海外宗族网络的家族成员虽然更为可能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或者取得大于初中教育程度，但接受过大于小学和本科教育程度方面却有显著降低的可能性。概言之，海外宗族网络有助于保障本土成员最低程度的教育获取，降低文盲率，但可能对于高等教育产生了挤出效应，这与本土宗族网络发挥的作用有所差异。

出现这一现象的可能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海外华人为其本土宗族成员提供的财务帮助更加慷慨，使得本土成员养成了更强的依赖性；此外，海外华人还可能会为本土成员提供海外市场的商业资源，引导家族成员在家族已经擅长的商业活动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削弱了本土成员的学习动机，提高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从而对本土家族成员的教育水平产生一定的挤出影响。<sup>①</sup>

表6 海外宗族网络的“造血”效应：教育状况

	(1)	(2)	(3)	(4)	(5)	(6)	(7)
	受教育年限 (年)	接受过教育	大于小学教 育程度	大于初中教 育程度	大于高中教 育程度	大于专科教 育程度	大于本科教 育程度
全国族谱数量（100本）	0.165*** (0.048)	0.003 (0.003)	0.017** (0.006)	0.026*** (0.006)	0.005 (0.003)	0.003 (0.002)	0.0001 (0.0003)
涉侨族谱数量（100本）	-2.031*** (0.572)	-0.213*** (0.075)	-0.531*** (0.102)	0.254** (0.109)	0.051 (0.062)	-0.033 (0.052)	-0.0145* (0.0087)
观测数	1,912,076	1,912,076	1,912,076	1,912,076	1,912,076	1,912,076	1,912,076
调整后 R <sup>2</sup>	0.498	0.323	0.399	0.307	0.184	0.077	0.007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姓氏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聚类到地级市层面。\*\*\*，\*\*，\*分别代表结果在1%，5%，10%统计意义上显著。

### （二）就业状况

表7使用工作年龄（16岁到70岁）的子样本展示了一系列个人就业与职业层面的指标对宗族网络回归的结果。第（1）列的结果表明，无论是本土还是海外的宗族网络，随着其强度增加，个体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会大大降低。第（2）列进一步发现即使进入了劳动力市场，拥有更强本土和海外宗族网络的个体每周的劳动时间也会更短（例如以打零工或者偶尔协助家族生意的形式）。该结果反映，宗族网络（无论本土或是海外）具有的“输血”效应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本土宗族成员的劳动积极性，挤出了它本该具有的“造血”效应，与表5的发现相一致。

第（3）列继续使用工作样本进行探究，发现拥有更强本土宗族网络或海外宗族网络的本土家族

<sup>①</sup> 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在贸易开放的冲击之下，低学历密集产业的扩张使个人教育投资意愿下降，甚至出现了“去技能化”的倾向（张川川，2015；Li，2018）。侨乡地区因为有与海外华人的宗族联系更加密集地发展出口部门（陈方豪和熊瑞驰，2022），故该地区的人员也更有可能会受到这一效应的影响。

成员更有可能留守其出生地而非迁移至外地。这显示宗族网络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本地性，也是对“安土重迁”内涵的一种直接体现。宗族网络既可以为本土家族成员在本地提供各类型的资源和社会资本，又可以通过传承相近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增强本土家族成员对家族身份的认同感，使他们更倾向于保持在祖籍地生活和工作。

在职业选择方面，第（4）列显示，本土宗族网络或海外宗族网络并不会提高本土家族成员在公共部门工作的概率。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公共部门的工作通常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门槛，而上文表 6 的结果显示，过强的海外宗族网络反而会挤出本土宗族成员在教育方面的投资。然而，根据第（5）列，在控制了本土宗族网络的影响之后，海外宗族网络的本土成员仍更有可能成为私营企业家，说明海外宗族网络的“造血”效应可能主要通过促进本土成员创业来实现。

### 3. 稳健性检验

#### （一）宗族网络的度量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使用全国族谱数量和涉侨族谱数量来测度宗族网络和海外宗族网络的强度。由于族谱在不同地域和不同姓氏上分布比较稀疏，在“姓氏-地级市”的层面族谱数量存在许多零值。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全体、海外宗族网络的强度的度量方式换为二值变量形式（即在“地级市-姓氏”层面“是否有全国族谱”和“是否有涉侨族谱”），重新估计方程（1）。如表 A2 所示，使用二值族谱数量得到的估计系数方向不变，除了海外宗族网络对于受教育年限的负向影响消失了之外，显著性水平也变化不大，并不改变基准回归的结论。

以数量或者二值方式度量宗族网络强度忽略了可能存在的边际效应的非线性。为了进一步检验本文的基准结论相对于宗族网络度量方式的稳健性，本文将本土宗族网络、海外宗族网络的强度的度量方式转变为非线性变量族谱数量的形式：具体而言，分别将全国族谱数量、涉侨族谱数量分为 1-2 本、3-4 本、5-7 本以及 7 本以上 4 个层级，以 0 本族谱作为参照系形成一系列的解释变量，重新进行估计。表 A3 的结果显示，本土宗族网络、海外宗族网络的经济福利效应符号保持不变，且可以看出系数大小整体随着族谱数量的增加而扩大。该发现排除了 U 型关系的存在，进一步佐证了使用族谱数量来度量宗族网络强度的合理性。

#### （二）使用迁移子样本

在方程（2）中，我们使用个体出生地的族谱数量作为其宗族网络的度量，并控制了所在地固定效应，从而排除所在地的文化习俗及经济发展状况对结果的干扰。然而受访者中存在大量出生地与所在地重叠的个体（ $o=c$ ）。为更加干净地分离出宗族网络的影响，我们使用所在地不同于出生地的迁移个体作为回归样本（ $o \neq c$ ），来重新估计方程（2），并加入所在地的族谱数量  $Lineage_{sc}$  和作为，估计结果展示于表 A4 之中。如表 A4 所示，出生地的宗族网络、海外宗族网络的系数依然显著，但现住地的宗族网络、海外宗族网络的系数却几乎不显著，这表明基准回归中发现的福利效应主要是由出生地而非所在地的本土宗族网络、涉侨宗族网络在发挥作用，而不太可能是由内生的迁移导致的。

#### （三）广东福建子样本

如表 2 所示，福建省和广东省是拥有涉侨族谱数量最多的地区，合起来占比超过 80%，现实中该两省也是以侨乡众多、宗族文化盛行而闻名。基准回归中发现的海外宗族效应很可能就是由广东福建两省拉动的，因此有必要对福建和广东两省做特殊的探讨。表 A5 展示使用福建广东地区的个体做回归样本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显示，海外宗族网络的系数变得更加显著，而本土宗族网络的系数变得不再显著。这说明在典型的沿海侨乡地区，海外的宗族网络在改善其成员经济福利上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

### 4. 小结：海外宗族网络的两面性

综合“输血”、“造血”两方面的证据，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通过为本土家族成员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和支持，海外宗族网络显著提升了本土成员的经济福利，但从长期来看却可能产生两

面性的影响。一方面，海外亲族的帮助可能导致被帮助的本土家族成员过度依赖宗族网络，从而缺乏自我提升的动机和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海外宗族网络也有可能为本土家族成员提供一定的资金、资源和市场机会，使他们有机会成为创业者并在市场中取得成功。宗族网络促进创业的证据并不鲜见（Peng, 2004；陈斌开和陈思宇, 2018；Zhang, 2020），但究竟海外宗族网络相对于本土宗族网络发挥了哪些特殊的作用，我们则将在第五节中进行更详细的探讨。

表 7 海外宗族网络的“造血”效应：就业状况

	(1)	(2)	(3)	(4)	(5)
	上周在工作=1 子样本				
	上周在工作	上周工作小时数 (小时)	发生迁移	在公共部门工作	私营创业
全国族谱数量 (100 本)	-0.020*** (0.006)	-1.494*** (0.397)	-0.165*** (0.042)	-0.004 (0.007)	0.048*** (0.012)
涉侨族谱数量 (100 本)	-0.860*** (0.105)	-36.582** (15.728)	-4.034*** (1.336)	0.134 (0.116)	0.757*** (0.133)
观测数	1,861,963	1,250,073	1,250,073	1,250,073	1,250,073
调整后 R <sup>2</sup>	0.375	0.112	0.318	0.409	0.04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姓氏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聚类到地级市层面。\*\*\*, \*\*, \*分别代表结果在 1%, 5%, 10%统计意义上显著。第（1）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的群体样本，第（2）至第（5）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且上周在工作（上周工作时间大于 0）的群体样本。

## 五、创业效应的机制分析

本小节致力于对海外宗族网络的“造血”渠道——促进本土成员创业背后的具体机制做深入的探讨。我们主要从私营企业的出口和融资两方面入手。这主要受两方面的事实启发：第一，实证证据表明社会网络可以经由信息促进贸易与投资（Rauch, 2001；Rauch and Trindade, 2002），而海外宗族网络本身是一种由移民和血缘构成的跨国社会网络，国际市场的信息可以经由这些网络流回侨乡，另外，拥有海外宗族网络内的个体相互信任更强，经由宗族组织执行合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更好地促进企业出口（Lever-Tracy et al., 1996）。第二，海外华人通常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可以为其宗族成员创业行为提供更加强力的融资支持。

本文使用 1998 年至 2007 年全国企业数据库中的本土私营企业样本估计如下的方程（2）：

$$Y_{ijsct} = \beta_1 \times Lineage_{sct} + \beta_2 \times Diaspora_{sct} + \mu_t + \delta_c + \lambda_j + \theta \times X_{it} + \epsilon_{ijsct} \quad (2)$$

其中下标  $i$ 、 $j$ 、 $s$ 、 $c$ 、 $t$  分别代表企业、行业、法人代表的姓氏、企业当前所在地市和年份。 $Y_{ijsct}$  表示一系列企业层面的经济指标，包括出口、TFP 和资本密度。 $Lineage_{sct}$  和  $Diaspora_{sct}$  是本文核心的解释变量，分别表示法人姓氏  $s$  在其企业年份  $t$  时所在地市  $c$  的全国族谱数量和涉侨族谱数量。同时加入两个解释变量的益处在于可以区分宗族文化和海外网络带来的影响。 $X_{it}$  为一系列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存续年数、政府资本占比、港澳台资本占比以及外商资本占比。 $\mu_t$ 、 $\delta_c$ 、 $\lambda_j$  分别为年份、地市和行业（2 位数）固定效应，控制了年份之间、地市之间、行业之间固有的差异。最后， $\epsilon_{ijsct}$  表示随机误差项。

与预期相一致，本文发现海外宗族网络在广延边际（是否出口）、集约边际（出口额度）和专业化程度（出口比重）上都可以促进企业的出口。根据表 8，本文发现企业所在地级市里其法人代表的姓氏每增加 10 本涉侨族谱，企业出口的概率会提高 6.4%，出口的金额提高 76.57%，出口额占工

业总产值比重提高 5.39%，在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上都特别显著。作为对照，本土宗族网络对于企业的出口行为并没有促进作用，甚至在出口比重上还起到了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海外宗族网络和本土宗族网络虽然都可以促进其成员的创业行为，但其发挥作用的机制有异质性，前者主要发挥作用于国际市场，后者则侧重于本土市场。过往研究中，蒙英华（2015）发现华人移民网络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但并未对其中宗族的特殊作用做出探讨。赵子乐等（2020）发现相同姓氏的私营企业家之间会分享出口市场信息，但并没有说明出口网络是如何起源的。本文的实证发现可以调和两篇文献的发现，显示中国的出口网络很可能是由海外宗族网络建立起来的（Lever-Tracy et al., 1996）。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社会网络之外，企业的出口行为还可能受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Melitz, 2003）。现实中，海外宗族网络也有以提升本土企业生产率的方式——如分享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促进企业出口。第（4）列的结果排除了这一可能，无论是本土宗族网络还是海外宗族网络都没有显著提升本土私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这与我国私营出口企业中存在大量低生产率的加工贸易企业的事实是一致的（戴觅等，2014）。

最后，第（5）列实证检验海外华人是否对其宗族成员创业提供了融资的帮助。我们将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除以员工人数之后再取对数（即资本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估计方程（2），发现不论是本土宗族网络还是海外宗族网络都显著提高了私营企业的资本密度。这表示海外宗族网络为本土宗族成员提供了融资支持，资金更加充裕的本土企业因此增加了对于固定资产的投资。

综上所述，海外宗族网络可以为本土成员提供类似于本土宗族网络的融资功能（马光荣和杨恩艳，2011；郭云南等，2013；林建浩等，2016）；但是本土宗族网络却无法提供类似于海外宗族网络提供的在国际市场开展生意的诸多便利，两种功能的综合降低了涉侨的本土族群从事出口方面的生意的进入门槛，使得海外宗族网络产生了强于本土宗族网络的创业促进效应。

表 8 机制分析：出口与融资

	(1)	(2)	(3)	(4)	(5)
	是否出口	$\text{arcsinh}^{-1}$ (出口额度)	出口额度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	TFP	$\text{arcsinh}^{-1}$ (资本密度)
全国族谱数量（100 本）	-0.011 (0.010)	-0.102 (0.101)	-0.015*** (0.004)	-0.003 (0.003)	0.028*** (0.009)
涉侨族谱数量（100 本）	0.644* (0.370)	7.657** (3.782)	0.539*** (0.204)	0.037 (0.059)	0.586*** (0.195)
观测数	122,789	122,789	122,789	122,789	122,789
调整后 R <sup>2</sup>	0.178	0.183	0.171	0.647	0.17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2 位数）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聚类到地级市层面。\*\*\*，\*\*，\*分别代表结果在 1%，5%，10%统计意义上显著。第（2）和第（5）列对企业出口额度、资本密度做了反双曲线函数（ $\text{arcsinh}^{-1}$ ）的变换。

##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在诸多方面贡献于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建设，对本土的宗族成员提供定向支持是其中的一种重要形式。本文借助最新电子化的涉侨族谱数据库，实证验证了“心系故乡”、“反哺桑梓”的宗族文化延续至了海外华人群体，并经由宗族的纽带从“输血”、“造血”两个渠道改善了本土家族成员的经济福利状况（虽然对劳动积极性形成一定的挤出作用），还一定程度上了塑

造侨乡的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

从国际比较而言，海外侨民对于其母国与家乡的影响是正或负尚无定论，因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借助海外华人实现快速发展的模式可谓十分亮眼。本文的结果表明，中华文明中源远流长的宗族文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至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绝大多数华侨是带着爱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愿望来的，与纯粹的外国投资不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2000）。宗族文化塑造了海外华人对乡土、家国的认同，鼓励他们身体力行参与家乡的建设，共同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今后的侨务工作要继续意识到这一点，服务好海外华人回乡探亲、祭祖、考察的需要。当前全球范围内地缘政治冲突不断，中国的对外经济网络承受压力，要特别重视通过侨务工作维护好华人华侨贯通海内外的信息、贸易与资本流动的桥梁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本文的发现局限于改革开放早期以及早期世代的移民。随着海外华人的代际更迭，第二三代移民对于中华文明、宗族文化的认同有逐渐弱化的趋势（Tan, 2006）。对此，新时代的侨务工作要积极主动，不仅重视“带回来”，更需要“走出去”，要积极联系海外华人社团体，促进海内外年轻群体之间的交流合作，弘扬与巩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新一代海外华人华侨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基因的一部分，要特别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有的吸引力、生命力、感召力，号召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

#### 参考文献

- 班国瑞、刘宏，2022：《亲爱的中国：移民书信与侨汇（1820—1980）》，东方出版中心。
- 陈斌开、陈思宇，2018：《流动的社会资本：传统宗族文化是否影响移民就业？》，《经济研究》第3期。
- 陈方豪、熊瑞驰，2022：《以侨为侨——侨资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中国经济学》第1期。
- 陈奕平、曹锦洲，2023：《国际移民与祖籍国经济现代化——以华侨华人为例的分析》，《华人华侨历史研究》第2期。
- 戴觅、余淼杰、Madura Maitra，2014：《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加工贸易的作用》，《经济学（季刊）》第13卷第2期。
- 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 傅高义，2013：《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2000：《邓小平论侨务》，中央文献出版社。
- 郭云南、姚洋，2013：《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管理世界》第3期。
- 郭云南、张琳弋、姚洋，2013：《宗族网络，融资与农民自主创业》，《金融研究》第9期。
- 黄静、屠梅曾，2009：《房地产财富与消费：来自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证据》，《管理世界》第7期。
- 林建浩、徐现祥、才国伟，2018：《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的文化与经济研究》，《经济研究》第11期。
- 林金枝，1984：《从福建侨乡族谱看南洋华侨史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第4期。
- 林勇，2007：《海外华人网络与FDI流入中国大陆的实证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3期。
- 孔飞力，2016：《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 林建浩、吴冰燕、李仲达，2016：《家庭融资中的有效社会网络：朋友圈还是宗族？》，《金融研究》第1期。
- 刘蓝予、周黎安、吴琦，2021：《传统商业文化的长期经济影响——基于明清商帮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11期。
- 龙登高，1999：《粤闽侨乡的经济变迁——来自海外社会资源的影响》，《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3期。
- 龙登高，2001：《粤闽侨乡先行改革的社会成本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3期。
- 龙登高、李一苇，2018：《海外华商投资中国40年：发展脉络、作用与趋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4期。

- 马光荣、杨恩艳, 2011:《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经济研究》第3期。
- 蒙英华, 2015:《移民网络对中国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研究》,《管理世界》第10期。
- 潘越、宁博、戴亦一, 2019:《宗族认同与公司治理——基于同姓高管“认本家”情结的研究》,《经济学(季刊)》第19卷第1期。
- 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 2022:《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 阮荣平、郑风田, 2012:《市场化进程中的宗族网络与乡村企业》,《经济学(季刊)》第12卷第1期。
- 任贵祥, 2009:《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中共党史出版社。
- 王赓武, 2016:《天下华人》,广东人民出版社。
- 王望波, 2005:《网络·社会资本·投资:对东南亚华商投资中国大陆特点的分析》,《南洋问题研究》第4期。
- 谢千里、罗斯基、张轶凡, 2008:《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与收敛》,《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3期。
- 余淼杰, 2013:《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生产率——企业异质性理论和实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 袁义达、张诚, 2002:《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赵子乐、林建浩, 2019:《海洋文化与企业创新——基于东南沿海三大商帮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2期。
- 赵子乐、林建浩、朱元冰, 2020:《企业家姓氏网络的出口外溢效应》,《经济学动态》第2期。
- 张川川, 2015:《“中等教育陷阱”?——出口扩张、就业增长与个体教育决策》,《经济研究》第12期。
- 张秀明, 2008:《改革开放以来侨务政策的演变及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互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3期。
- 章元、陆铭, 2009:《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管理世界》第3期。
- Agrawal, A., D. Kapur, J. McHale, A. Oettl, 2011, “Brain Drain or Brain Bank? The Impact of Skilled Emigration on Poor-Country Innovat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9: 43–55.
- Bahar, D., A. Hauptmann, C. Özgüzel and H. Rapoport, 2022, “Migration and Knowledge Diffusion: The Effect of Returning Refugees on Export Performance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Forthcoming.
- Brandt, L., J. Van Biesebroeck and Y. Zhang, 2012,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7, 339-351.
- Brandt, L., J. Van Biesebroeck and Y. Zhang, 2014, “Challenges of Working with the Chinese NBS Firm-level Dat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4, 30, 339-352.
- Burchardi, K. B., T. Chaney and T. A. Hassan, 2019, “Migrants, Ancestors, and Foreign Investment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6(4), 1448-1486.
- Chen, F., R. Xiong and X. Zhang, 2023, “Familiar Strangers: The Role of Diaspora Networks i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ong-run Development”, Available at SSRN: <https://papers.ssrn.com/=4004159>.
- Chen, T., J. K. Kung and C. Ma, 2020, “Long Live Keju!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Economic Journal*, 130, 2030–2064
- Dincecco, M. and Y. Wang, 2020, “Internal Conflict and State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Imperial China”,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209556>.
- Docquier, F. and H. Rapoport, 2012, “Globalization, Brain Drain,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0(3), 681–730.
- Freedman, M., 1965,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University Athlone Press.
- Gao, T., 2003, “Ethnic Chinese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Inward FDI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4(4), 611-629.
- Greif, A. and G. Tabellini, 2017, “The Clan and the Corporation: Sustaining Cooperation in China and Europ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5, 1-35.
- Gibson, J., D. McKenzie and S. Stillman, 2011, “The Impac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Remaining Household Members: Omnibus Result from a Migration Lottery Program”,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4), 1297–1318.
- Giuliano, P. and M. Ruiz-Arranz, 2009, “Remittanc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0, 144-152.



- Kerr, W. R., 2018, *The Gift of Global Talent: How Migration Shapes Business, Economy and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hanna, G., E. Murathanoglu, C. B. Theoharides and D. Yang, 2022, “Abundance from Abroad: Migrant Income and Long-Run Economic Development”, NBER Working Paper, 29862.
- Lever-Tracy, C., D. Ip and N. Tracy, 1996,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Mainland China: An Emerging Economic Synergy*, Macmillan Press Ltd.
- Li, B., 2018, “Export Expansion, Skill Acquisition and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4, 346-361.
- Melitz, M.,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71(6), 1695-1725.
- Peng, Y., 2004, “Kinship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5), 1045-1074.
- Rauch, J. E., 2001, “Busines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9(4), 1177–1203.
- Rauch, J. E. and V. Trindade, 2002, “Ethnic Chinese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4(1), 116-130.
- Saxenian, A., 2006, *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Sequeira, S., N. Nunn and N. Qian, 2020, “Immigrant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7(1), 382-419.
- Shiue, C., 2016, “A Culture of Kinship: Chinese Genealogies as a Source for Research in Demographic Economics”, *Journal of Demographic Economics*, 82, 459-482.
- Tan, C., 2006, *Chinese Transnational Networks*, Routledge.
- Tong, S. Y., 2005, “Ethnic Networks in FDI and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4), 563-580.
- Yang, D., 2011, “Migrant Remitt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3(3), 129-152.
- Zhang, C., 2020, “Clans,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8(1), 100-123.

## 附录

### 1.变量的来源与定义

表 A1

变量的来源与定义

变量名	定义	年份范围	来源
<b>姓氏-地级市层面</b>			
涉侨族谱数量	涉侨族谱数量（本）	——	《华侨华人族谱数据库》
全国族谱数量	全国族谱数量（本）	——	《中国家谱综合目录（CCCG）》
<b>个人层面</b>			
住房间数（间）	住房间数（间）		
住房建筑面积（十平方米）	住房建筑面积（十平方米）		
住房内拥有独立厕所	住房内有独立厕所取1，否则取0		
拥有购建住房	有自建住房或购买商品住房或购买经济适用房或购买原公有住房取1，否则取0		
购建住房费用（元）	购建住房费用（元）		
月租房费用（元）	月租房费用（元）		
主要生活来源由家庭其他成员供养	主要生活来源由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取1，否则取0		
主要生活来源为保障性收入	主要生活来源为保障性收入取1，否则取0		
主要生活来源为财产性收入	主要生活来源为财产性收入取1，否则取0		
主要生活来源为劳动收入	主要生活来源为劳动收入取1，否则取0	2005	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上月劳动收入（元）	上个月（或按年收入折算）的月收入（元）		
接受过教育	接受过教育取1，否则取0		
大于小学教育程度	大于小学教育程度取1，否则取0		
大于初中教育程度	大于初中教育程度取1，否则取0		
大于高中教育程度	大于高中教育程度取1，否则取0		
大于专科教育程度	大于专科教育程度取1，否则取0		
大于本科教育程度	大于本科教育程度取1，否则取0		
受教育年限（年）	受教育年限（年）		
上周在工作	上周在工作取1，否则取0		
发生迁移	出生地≠当前所在地取1，否则取0		
上周工作小时数	上周工作小时数（小时）		

在公共部门工作	工作单位为机关团体事业单位或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或集体企业取 1，工作单位为土地承包者或个体工商户或私营企业或其他类型单位或其他取 0
私营创业	就业身份是雇主或自营劳动者取 1，就业身份是雇员或家庭帮工或土地承包者取 0
性别（男取 1）	男取 1，女取 0
年龄（年）	年龄（年）
家庭人口（人）	2005 年 10 月 31 日晚居住在本户的人数加未居住在本户的人数（人）
健康	身体健康或基本能保证正常的生活工作取 1，不能正常工作或生活不能自理取 0
汉族	汉族=1，少数民族=0
非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1，农业户口=0
已婚	初婚有配偶或再婚有配偶或离婚或丧偶取 1，未婚取 0
姓氏	受访者姓氏
地级市	受访者所在地级市

#### 企业层面

是否出口	出口交货值(千元)大于 0 则取 1，否则取 0
企业出口额度	出口交货值(千元)
企业出口额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	出口交货值（千元）除以工业总产值（千元）
TFP	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式同 Brandt et al. (2012)
资本密度	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千元）除以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人）
企业存续年数	调查年份减去企业创立时间（年）
政府资本占比	政府资本除以总注册资本
港澳台资本占比	港澳台资本除以总注册资本
外商资本占比	外商资本除以总注册资本
年份	调查年份
地级市	企业所在地级市
行业（2 位数）	行业代码（2 位数）

1998-2007

工业企业数据库

## 2. 工业企业的筛选流程

本文参照谢千里等（2008）和余淼杰（2013）的方法进行样本筛选：（1）剔除关键指标缺失的企业样本；（2）剔除明显不符合逻辑关系的观察值，如总资产、固定资产总额、工业总产值、注册资本、长短期投资、利息支出、工业增加值、应付工资、应付福利为负值、成立时间异常、所在省市代码异常的企业样本；（3）剔除营业收入低于 500 万元、员工人数小于 8 人及名称重复的企业样本；（4）剔除明显违反会计准则的企业，即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总额或流动资产，或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

### 3.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 A2 二值族谱数量

	(1)	(2)	(3)	(4)	(5)	(6)
						上周在工作=1 子样本
	住房建筑面积 (十平方米)	受教育年限 (年)	上周在工作	主要生活来源由家庭 其他成员供养	主要生活来源为 劳动收入	私营创业
是否有全国族谱	3.109*** (0.910)	0.009 (0.013)	-0.005*** (0.002)	0.008*** (0.002)	-0.006*** (0.002)	0.009*** (0.002)
是否有涉侨族谱	11.155*** (3.996)	0.008 (0.033)	-0.030*** (0.007)	0.028*** (0.008)	-0.030*** (0.008)	0.026*** (0.008)
观测数	1,912,076	1,912,076	1,861,963	1,861,963	1,861,963	1,250,073
调整后 R <sup>2</sup>	0.191	0.498	0.375	0.303	0.393	0.04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姓氏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聚类到地级市层面。\*\*\*，\*\*，\*分别代表结果在 1%，5%，10%统计意义上显著。第（3）至第（5）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的样本，第（6）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且上周在工作（上周工作时间大于 0）的工作样本。

表 A3

非线性族谱数量

	(1)	(2)	(3)	(4)	(5)	(6)
						上周在工作=1 子样本
	住房建筑面积 (十平方米)	受教育年限 (年)	上周在工作	主要生活来源 由家庭其他成 员供养	主要生活来源 为劳动收入	私营创业
全国族谱数量 (1-2 本)	1.871*** (0.633)	-0.004 (0.013)	-0.003** (0.002)	0.005*** (0.001)	-0.004** (0.001)	0.007*** (0.002)
全国族谱数量 (3-4 本)	3.708*** (1.051)	0.023 (0.015)	-0.006** (0.002)	0.009*** (0.002)	-0.006*** (0.002)	0.010*** (0.003)
全国族谱数量 (5-7 本)	5.538*** (1.469)	0.004 (0.023)	-0.006* (0.003)	0.012*** (0.003)	-0.008*** (0.003)	0.009*** (0.003)
全国族谱数量 (7 本 以上)	8.134*** (2.391)	0.077*** (0.027)	-0.012*** (0.003)	0.018*** (0.003)	-0.014*** (0.003)	0.019*** (0.005)
涉侨族谱数量 (1-2 本)	8.012*** (2.873)	0.018 (0.034)	-0.022*** (0.006)	0.020*** (0.006)	-0.022*** (0.006)	0.017** (0.009)
涉侨族谱数量 (3-4 本)	12.313** (4.993)	-0.004 (0.035)	-0.045*** (0.013)	0.042*** (0.013)	-0.042*** (0.013)	0.030*** (0.009)
涉侨族谱数量 (5-7 本)	13.220 (8.461)	-0.155*** (0.041)	-0.046*** (0.008)	0.039*** (0.014)	-0.046*** (0.013)	0.048*** (0.009)
涉侨族谱数量 (7 本 以上)	26.734*** (6.442)	-0.242*** (0.031)	-0.040*** (0.007)	0.048*** (0.010)	-0.039*** (0.008)	0.054*** (0.008)
观测数	1,912,076	1,912,076	1,861,963	1,861,963	1,861,963	1,250,073
调整后 R <sup>2</sup>	0.192	0.498	0.375	0.303	0.393	0.04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姓氏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聚类到地级市层面。\*\*\*，\*\*，\*分别代表结果在 1%，5%，10%统计意义上显著。第 (3) 至第 (5) 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的样本，第 (6) 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且上周在工作（上周工作时间大于 0）的工作样本。

表 A4

迁移子样本

	(1)	(2)	(3)	(4)	(5)	(6)
	住房建筑面积 (十平方米)	受教育年限 (年)	上周在工作	主要生活来源由家 庭其他成员供养	主要生活来源 为劳动收入	上周在工作=1 子样本 私营创业
出生地全国族谱数量 (100 本)	0.915*** (0.236)	0.820*** (0.102)	-0.022 (0.016)	0.046*** (0.017)	-0.034** (0.016)	0.110*** (0.018)
出生地涉侨族谱数量 (100 本)	20.269*** (5.337)	-2.328 (1.549)	-0.880*** (0.213)	0.995*** (0.210)	-0.841*** (0.232)	1.089*** (0.341)
现住地全国族谱数量 (100 本)	-0.052 (0.096)	-0.270*** (0.061)	-0.005 (0.011)	-0.014 (0.011)	0.007 (0.012)	-0.028*** (0.010)
现住地涉侨族谱数量 (100 本)	1.331 (1.982)	1.988 (1.342)	0.139 (0.179)	-0.302 (0.191)	0.166 (0.183)	0.180* (0.104)
观测数	154,705	154,705	153,249	153,249	153,249	112,546
调整后 R <sup>2</sup>	0.271	0.401	0.313	0.177	0.314	0.13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姓氏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聚类到地级市层面。\*\*\*，\*\*，\*分别代表结果在 1%，5%，10%统计意义上显著。第（1）至第（2）列使用迁移样本（出生地≠当前所在地），第（3）至第（5）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的迁移样本，第（6）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且上周在工作（上周工作时间大于 0）的迁移样本。

表 A5

## 广东福建子样本

	(1)	(2)	(3)	(4)	(5)	(6)
						上周在工作=1 子样本
	住房建筑面 积 (十平方 米)	受教育年限 (年)	上周在工作	主要生活来源由家 庭其他成员供养	主要生活来源为 劳动收入	私营创业
全国族谱数量 (100 本)	-0.595 (0.427)	0.153 (0.123)	0.002 (0.023)	0.0002 (0.0194)	0.008 (0.021)	0.040*** (0.008)
涉侨族谱数量 (100 本)	40.273*** (9.045)	-0.803 (0.582)	-0.820*** (0.136)	0.7290*** (0.1327)	-0.847*** (0.044)	0.438*** (0.139)
观测数	289,595	289,595	281,324	281,324	281,324	185,217
调整后 R <sup>2</sup>	0.194	0.481	0.362	0.2777	0.364	0.05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姓氏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聚类到地级市层面。\*\*\*，\*\*，\*分别代表结果在 1%，5%，10%统计意义上显著。第（1）至第（2）列使用广东福建样本，第（3）至第（5）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的广东福建子样本，第（6）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且上周在工作（上周工作时间大于 0）的广东福建子样本。